

“克隆一个鸡蛋?”

□金坚范

1998年4月初,中国作协时任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找我谈话,说郑伯农同志已超过任职年龄,由我接任《文艺报》总编辑一职。隔行如隔山,我是学英语出身,长期从事英语口译和外事行政组织工作。在文学界“打工”多年,编辑工作一窍不通,写评论文章做梦都未曾想过,所以我当场予以婉拒。他锲而不舍又找我谈了两次,我是软磨硬抗,死活不从。逼到墙角里,我说:“这是要让鸭子下鸡蛋。”他迅即一笑:“现在不是有克隆技术吗,你就克隆一个鸡蛋吧。”智斗败下阵来,只能服从组织决定,走马上任。

《文艺报》比共和国的历史还长。茅盾、丁玲、冯雪峰、张光年等前任领导人,无不是让我肃然起敬的名字。即使是后来的几位总编辑,也都是知名编辑家、评论家。忝任总编辑,实有狗尾续貂、滥竽充数之感。

当时《文艺报》面临三大困难。人际关系复杂,特别是社一级领导班子,总编辑、副总编辑、副社长共有9人之多。虽非“九龙治水”的局面,但人多嘴杂、各执己见。

且《文艺报》员工才50人,领导占了9人,头重脚轻,比例失调。经过逐步调整,形成了一正两副的三人班子。经费严重短缺,稿费、医疗费报销常常拖了又拖,有时连下个月工资在哪儿都是问题。真可谓左支右绌、捉襟见肘。文章千古事,苟且不得。版面好坏是一张报纸的关键之关键,恰恰在组

稿上又困难不小。

古人说:“欲戴其冠,必承其重。”王冠之重在于责任。既然“上得梁山”,便守土有责。按泰丰同志说法,我能否“克隆一个鸡蛋”呢?

好在《文艺报》有一个很好的集体。

无论是编辑还是行政后勤人员,他们

“认庙不认神”,对于我这个小学生水平的人并不嫌弃、心存偏见,相反是热诚欢迎,坚决支持我的工作。我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,他们坦诚相告。有些人还未排上队,便迫不及待主动到作协办公室向我介绍情况。令我感动的是,有些私密的内心深处的想法,也不避我。

穷则思变,困则谋通。《文艺报》的工作人员,业务能力都很强,有些还颇有建树,苦于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,所以无论是在全

体会上还是个别谈话时,要求从改革中寻找生机和活力的呼声,甚嚣尘上。情同乃聚,气合乃群。不满足现状、从困境中奋起,大家思想一致、情绪高涨,是报社改革的前提和坚实基础。改革开放是国之大计,道大无外,也是《文艺报》的出路所在。顺势而为,我委托李兴叶同志主持调查研究,提出改革方案,以使大家各安其位、各展其能。改革的方向,根据两位副总编辑的意见,《文艺报》当努力成为在文艺问题上为中央建言献策的智库,在文艺界保持话语权。

1999年年底,方案几经协商,尘埃落

定,决定于2000年起改版。为纪念创刊55周年,2004年9月25日出版的《文艺报》我一直保存着,因其第一版醒目地刊登着标题新闻《中国大学(复印报刊资料)文学艺术类全文转载量本报2000—2002年连续三年排名第一》,于我而言,这一消息有特殊意义。

首先,这是我退休一年多之后的《文艺报》,是后任对我工作的肯定。2000年是改版第一年,当年就成绩骄人。在全国报纸全文转载量中,连续三年《文艺报》名列第三,屈居于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之后,而在文艺类报纸中,《文艺报》稳坐第一。这是中国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公开发布的统计,具有权威性。最后,《文艺报》历史上第一次荣获全文转载量第一的桂冠。

记得2000年新年伊始,《文艺报》以《文学周刊》《艺术周刊》《作家论坛周刊》的形式甫一出版,便好评如潮。文艺界朋友、熟人有些打电话对我给予肯定,有些见面时当面赞扬。寿登九秩的“左联”老人、中国作协顾问林林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,最近报纸办得好,提出了一些新问题。

《文艺报》这几年发表的文章,除了文学艺术界普遍叫好外,文化部办公厅、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、中央政策研究室资料室等单位,不时打电话来,要我们多赠几份某期报纸。记得2003年,中央政策研究室

顺便提一下,有些引起重大反响的好文章,是《文艺报》自己提出选题约稿的。例如,《文艺报》约请曾庆瑞教授撰写的《刹一刹亵渎文学名著和经典的歪风》一文,发表后国家广电总局发红头文件,要求各地电视台学习此文。根据中宣部的要求,中国文联专门召开研讨会,邀请专家学者讨论此文。

追忆在《文艺报》5年的峥嵘岁月,虽非处处逢春,成绩骄人,但也不是乏善可陈。我克隆的鸡蛋,不知道泰丰同志是否满意?不管怎样,感谢泰丰同志对我在《文艺报》工作的支持。

已故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邓拓同志有一句诗:“文章满纸书生累,风雨同舟战友贤。”想起当年《文艺报》的同事们,感谢他们以自己的努力和聪明才智成就了《文艺报》走出困境,体现了患难之交情谊深。想起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友谊,温其如玉!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华诞。我所在的工作单位《文艺报》有幸同祖国一起过生日,因为它创刊于1949年9月25日。

70年前,我是一个学生,在重庆解放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,从此当了30年的文艺兵。“文革”后,百废待兴,复刊不久的《文艺报》缺人手,我便申请转业,从海军调到《文艺报》工作。报到那一天是1979年6月9日,正是文艺界拨乱反正、平反冤假错案,为新人新作鸣锣开道的忙碌时期。

创刊70年,我在《文艺报》度过了40年时光。我来《文艺报》时已经49岁。不仅年龄偏大,而且是一个搞创作的,能做编辑吗?主编冯牧同志曾就我“改行”一事说过这样的话:“搞过创作的人来编辑刊物也有好处,就是懂得创作的甘苦,对待别人的作品能手下留情,不至于乱打棍子。”这是对我的鞭策,至今不曾忘却。

1979年3月我去了一次北京东四礼士胡同《文艺报》的办公地,那是向文化部借用的两间房,十分拥挤。5月再去时,办公地点已搬到北京沙滩北街2号文化部大楼中,一部分同志在楼前的地震棚里上班。那天我认识了另一位笑容可掬的主编孔罗荪同志,分工艺术评论稿件的文椿同志对我说:“办公室里已经摆好了你的桌子,快来上班吧!”犹如一股扑面而来的春风,让我感到了温暖。

我到《文艺报》后,立即与文椿、杨天喜同志一起组成复刊后的艺术评论组。6月13日报社宣布召明同志为我们组的临时负责人,4人就在一个房间里工作了。召明是老《文艺报》人,文椿和杨天喜是多年同艺术界打交道的老编辑。他们对于我这个“改行”而来的老兵新手给予了热情帮助、关怀备至。我们各自编完的稿件都彼此传阅,毫无顾虑地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或建议。艺术创作的门类很多,每人都只能有一个大致的分工,忙不过来时都是全组一起盘棋,互相补台的。虽然1980年召明调往报社办公室,天喜同志在退休之后病故,但我们在艺术评论组结下的友谊是永存的。

到《文艺报》工作后,让我感到最突出的一个特点,便是学术空气的厚重与实在。每期刊物的编前会、编委会,都是从主编到副主编到编辑组,发行组、办公室全体人员都出席。党中央的指示精神、文艺界的重大事件、新作品的介绍、各种现象与问题的来龙去脉、主编的决策与组稿计划、读者对刊物的反应、编辑部内对重要问题不同看法的争论,都能在会上听到。参加这样的会,我总是感到新奇,激动而又收获满满。我在《文艺报》上发表的第一篇短评是评论海政话剧团的《为了祖国》。这篇题为《侨胞的心声》的文章共1700字,刊登于《文艺报》1979年9月号上,从看戏、读剧本,到写初稿,听取同事和领导的意见,修改完成,历时52天。

在《文艺报》当编辑,一大任务是要想方设法发表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、评论家的高质量文章。我约名家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戴不凡先生的《〈大风歌〉小赞》共6600字,发表于《文艺报》1979年10月号上。为组稿计划的落实,我先阅读了陈白尘先生的话剧剧本,8月16日期间去人民剧场观看了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出。8月30日上午,我到戴不凡先生家中拜访、约稿,当时他正在家中病休。他同意写这篇文章,但又说看过剧本,未看过演出。当天下午我到二七剧场,代编辑部购买到9月1日、2日两晚的《大风歌》戏票30张。除了安排戴先生9月1日看戏外,报社的同事们也观摩了此戏。我托一位朋友从《红旗》杂志社资料室借来江苏省刊物《群众》1979年第3期,上面刊登了陈白尘《大风歌》创作经过的文章。此刊物于看戏时交给戴先生,以供其参考。9月5日上午,我第二次去戴家,他不在家,留下了《群众》杂志,让他的女儿还给我,并转告我:“一个星期交稿。”9月17日上班时,我见到了他托人送来的《〈大风歌〉小赞》一文的手稿。10月12日,读者在新出版的《文艺报》第10期上见到了这篇见解透彻、功力深厚的文章。不料想4个月之后的1980年2月18日,戴先生竟因心肌梗塞而突然去世,年仅58岁。3个月之后,我到华东了解戏剧创作情况,5月28日见到陈白尘先生,他感慨地说:“戴不凡的文章见到了,他还给我寄了一本《小说见闻录》,还没收到他就去世了,很可惜!”

作为一个编辑,如何处理好本职工作与业余写作的关系?冯牧同志在1984年1月13日下午召开的编辑部全体同志会议上,做过一次语重心长的发言,他在发言中说:“凡是走上编辑岗位的人,没有不愿意成为理论家、批评家的。许多大文学家都做过编辑。想当文学家、批评家,这是正当的愿望。但是要达到这一愿望,首先要学好编辑本领,使自己具有文字水平、理论水平、分析水平。年轻的同志应以最快的速度使自己成为一个熟练的、热情的、有分析能力的编辑。识别、判断作品的能力,这是永远不能满足的。”

我觉得,这是主编冯牧同志发自内心的金玉良言,愿以此作结,与大家共勉。



《文艺报》办公地点的变迁

□寒小风

1978年7月,《文艺报》复刊,当时的办公地点在东四礼士胡同129号。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是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,粉粹“四人帮”后这个院子由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使用。冯牧同志是文化部党组成员、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,同时也是《文艺报》的主编。《文艺报》复刊后没有办公地点,他就从政策研究室挤出两间房作为《文艺报》临时办公地。此院是两个并排四合院,院子之间有走廊相连,后面是个小花园,有水池、亭子、花草。整个院子雕梁画栋,前廊后厦,精美雅致。《文艺报》办公室在东院,一间坐北朝南,编辑部谢永旺、召明、黄文珍、陈新民,李燕平和我在这儿办公;另一间南北走向的大房间,是陈丹晨、阎纲、刘锡诚、吴泰昌、郑兴万、雷达、高洪波、文椿、杨天喜等编辑的办公室。我们编辑部这间屋原来是于会泳的办公室,屋里铺着厚厚的浅色地毯,摆放着一大两小三个沙发,卫生间有进口高级浴缸。我和李燕平、陈新民都是从兵团回北京的知青,李燕平是编务,陈新民是美编,我负责机要通讯和行政事务。在这个古色古香的院子里办公,编辑部讨论研究的都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大问题。在那个时代,《文艺报》是文艺界的旗帜。

《文艺报》在这里待了一年多的时间。1979年底,上

级决定将《文艺报》办公地址搬迁到东城区沙滩北街2号,就是现在北大红楼后面的五四广场。当时广场的空地上盖满了简易两层办公楼,中国文联、中国作协、《文艺报》,还有文联其他几个协会都在这里办公。《文艺报》在这里有两个办公地点,一个是《求实》杂志社大楼5楼两间标准办公室和一间大办公室,《文艺报》的理论部、评论部、艺术部在5楼办公;还有一个是一栋两层简易楼,楼上是新闻部、小会议室,楼下是副主编办公室、编务部、行政办公室和资料室。主编冯牧、孔罗荪在中国作协有领导出席了剪彩仪式。大楼工地是在一片菜地上,周边除了农展馆就没有别的楼房了。那时三环路还没有全线通车,建长虹桥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儿。1987年大楼落成,当年8月《文艺报》搬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中国文联大楼,大楼第6层加上第7层的一个房间属于《文艺报》。当时没有搬家公司,我们从中国作协借来卡车,报社的年轻人冒着酷暑,一连搬了一个星期。从1978年7月复刊到1987年8月,9年过去了,《文艺报》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。

从1978年8月到2006年8月,我在《文艺报》工作了28年时间。在《文艺报》创刊70周年之际,写下一点我经历的《文艺报》办公地变动过程作为纪念。

我永远怀念在《文艺报》工作的日子!

往事萦怀

□钟艺兵